

编与读

做古陶瓷艺术的传播者

本报记者 郭海瑾

近日,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举办了第四期“文史讲堂”专题讲座,邀请吕成龙委员讲述如何欣赏中国古陶瓷。吕成龙是中国古陶瓷文化的研究者、传播者,他用专业的知识和深厚的情怀,为大家揭开古陶瓷的神秘面纱。

今年是吕成龙研究古陶瓷的第40年。1984年大学一毕业,他便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因为学的是陶瓷,所以就分到了陈列部陶瓷组。自此,便开始了她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古陶瓷研究。

“古陶瓷学习,没有十年八年的苦功,根本入不了门。”吕成龙说。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学,逐渐积累,勤于实践,没有捷径可走。1996年,他到福建建窑遗址调查后,撰写了学术论文《试论建窑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南宋建窑鹧鸪斑茶盏的存在,并从此找到了自己研究的切入点,即研究古陶瓷离不开窑址调查。他一头扎进古陶瓷的学习研究中,一干就是40年。直到今天,说起古陶瓷,他依然难掩兴奋,充满自信。

如今,吕成龙依然奋斗在古陶瓷研究的第一线,但更多是在做一名古陶瓷文化的传播者。他说,中国陶瓷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丰厚的历史文化。其在造型、釉色、纹饰等方面凝聚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审美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中国陶瓷必将受到愈来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作为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把古陶瓷所承载的深厚历史文化传播给大众,让更多人领略中国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感受其所蕴含的历史温度和文化底蕴,从而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热爱,增强文化自信。

讲坛信息

“从敦煌到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讲座举行

为赓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发展,10月15日上午,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受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从敦煌到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专题讲座。

王旭东讲到,敦煌与故宫作为文化遗产,打通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记忆,都是中华文化互鉴的例证。莫高窟保留了由汉代至元代上千年的文化遗存,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与鲜明特色。而故宫作为明清皇家宫殿,它的营建则是国家和帝王意志的体现。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集大成者,其规划布局承载了中国所在地区万年以来延绵不绝的农业文化与文明最为核心的知识与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了人文秩序遵从自然秩序的礼制思想,以及天人合一、顺势施政、持续发展的思想观念。同时,故宫186万多件藏品,汇集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讲座中,王旭东系统梳理了百年来莫高窟与故宫的保护历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保护史,强调二者的保护必须在国家的主导下,充分借助科技的支撑和法律法规基础上的有效管理,才能完整保护好这两处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他还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介绍了全程见证参与的敦煌保护项目,以及故宫博物院正在实施的“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等。

王旭东表示,敦煌与故宫向我们展示了文明之延续、文化之厚重、历史之镜鉴,启示我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我们应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加宽阔的胸怀,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不断丰富中华民族优秀文明。

(郭海瑾)

编者的话:

日前,“紫玉匠心——中国建窑建盏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建窑是宋代著名瓷窑,其遗址位于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历史上以烧造黑釉瓷而著称。创烧于晚唐五代,兴盛于两宋。产品以碗类居多,文献称之为“甌”或“盏”,今天统称“建盏”。虽然建盏的造型和釉色较为单一,但其氧化铁所形成的结晶却变化万千,给人带来非同一般的审美享受,并使建盏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本期讲坛邀请吕成龙委员结合自己40年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心得,讲述建窑瓷器的魅力。



▲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

主讲人简介:

吕成龙,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器物部首席专家,并任故宫研究院陶瓷研究所所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特聘专家等。曾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古陶瓷鉴定、展览、保管等研究工作,注重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纹饰、胎釉彩、烧造工艺和款式特征等研究。出版过专著3部,主编过20多部专业图书,发表过逾百篇学术论文和文章,实地调查过数十个古陶瓷窑址。多次应邀赴美国、德国、法国、土耳其、韩国等国家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作学术交流和演讲。



主讲人:吕成龙

建窑瓷器的魅力



▲ 吕成龙2007年考察龙泉窑大窑遗址金村片区

建窑是我国宋代著名的黑釉瓷窑,其遗址位于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废品堆积散布于池中村、后井村周围的芦花坪、大路后门、源头坑、牛皮仑、营长墩(又名社长墩)、庵尾山(又名庵尾山)等处山坡上,范围达10余万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建窑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与发掘,清理了十几座龙窑遗址,出土大量瓷器标本及窑具、工具标本,为研究建窑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古文献中建窑的命名

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之“建”字多被理解为福建的“建”。故“建窑”有两处所指,一为今福建省的德化窑;一为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窑。然而,两窑产品常被张冠李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陶瓷考古,纯属于“书斋考古”,古陶瓷研究者常常是人云亦云,著述立说也是辗转传抄。20年代以后,叶麟趾、陈万里先生开创了一条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新路,即调查窑址与文献记载相结合,遂澄清了以往许多错误结论。

实际上,建窑应专指今福建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窑,而建窑之得名却与建阳无关。这是因为我国唐宋时代瓷窑常以所在的州、县命名。水吉镇位于今南平市建阳区东北境与建瓯市的北部,在古代行政区划中,水吉镇属于建瓯而不属于建阳。宋代以前,建瓯称“建安郡”和“建州”(唐武德五年改建安郡为建州)。宋代,水吉镇归建宁府瓯宁县管辖(瓯宁县本为建安县地,北宋英宗治平三年置)。所以“建窑”应得名于“建安”“建州”或“建宁”,而与“建阳”无涉(林忠干、谢道华、张文彦《建窑系黑釉碗类考》,《福建文博》1996年第2期)。宋代文献记载亦可证明,例如北宋蔡襄《茶录》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南宋祝穆《方輿胜览》亦曰:“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黄鲁直诗曰:‘建安瓷碗鹧鸪斑。’”这些记载均准确无误。

宋代的点茶、斗茶

对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证明,建窑创烧于晚唐、五代时期,当时以烧造青釉瓷为主,兼烧少量黑釉瓷。宋代是建窑的兴盛时期,大量烧造黑釉茶盏,兼烧部分青釉、青白釉瓷。元代以后,建窑渐趋衰落,至清代,曾一度烧造青花瓷。

在宋代文献里,建窑黑釉茶碗多被称为“盏”,也有称“碗”和“甌”者。今天统称“建盏”。建盏造型的特点是口大、腹深,足小,形如漏斗。盏壁斜下,微微有些弧度。底下多承以旋削矮浅的圈足,也有少数为平底略内凹。一般高4-7厘米,口径9-12厘米、足径3-4厘米。亦有超出这个尺寸范围的。

总体说来,建盏的胎体较厚重,但各部位厚度不等。口部最薄,从口往下逐渐变厚,最厚处在底部,约1厘米。建盏的胎体比较粗糙,含有大量的石英砂粒和气孔,系使用氧化铁含量较高的黏土制成。由于胎中氧化铁含量高达约7%-10%,故烧成后胎色多呈紫黑或灰黑色,少数呈深褐色。

建盏最微妙之处在于变幻莫测的釉色。紺黑如漆的釉挂得很厚,外壁施釉不到底,致使底部露胎。高温熔融状态下釉层垂流,自上而下逐渐变厚,口部内外釉层最薄,呈深褐色或赭黄色,盏壁下部及内底釉层最厚。外壁垂釉常聚集成泪滴状。建盏除纯黑釉盏以外,最大为人

称道的是兔毫斑盏、鹧鸪斑盏和曜变盏。

兔毫斑釉是建盏最为流行的釉,在黑色釉面上呈现竖向丝缕状的自然纹理,细密如兔毛,因而被称为“兔毛斑”或“兔毫斑”。斑纹的颜色主要有两种,一种呈银灰色,被称为“银兔毛”或“银兔毫”;另一种呈金黄色,被称为“金兔毛”或“金兔毫”。也有将“兔毫”称为“玉毫”者。关于建窑兔毫盏,宋代文献多有记载,今人亦无争议,在此不必赘述。

曜变釉盏极为罕见。“曜变”是指光照之下而呈现的异彩。曜变盏内外黑色釉面上呈现大小不一的圆形或近似圆形的斑点,斑点的分布并不均匀,几个或几十个聚在一起,经光线照耀,斑点的周围有炫目的晕彩变幻,呈现蓝、紫红、金黄等色,璀璨相映,珠光闪烁,确属绝品。有研究者认为,曜变是鹧鸪斑釉中的特殊品种。

鹧鸪斑釉盏的数量稍多于曜变盏。目前已最早记载建窑鹧鸪斑盏的文献,是五代末至北宋初人陶谷《清异录》。该书“禽名门三十二事”之“锦地鸚”条曰:“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于书馆,江南黄是甫见之曰:鹧鸪亦数种,此锦地鸚也。”此后,宋代的文人亦留下有关建窑鹧鸪斑盏的诗句。如黄庭坚的“建安瓷碗鹧鸪斑”“金缕鸚斑”,诗僧惠洪的“鹧鸪斑中吸春露”“玉瓯纹刷鹧鸪斑”,杨万里的“鹧斑碗面云紫字”等,这充分说明建窑鹧鸪斑盏的存在。明清时期的谈瓷之书仍有建窑鹧鸪斑盏的记述,然而由于著书之人的局限性,致使多凭空想象。有人以为鹧鸪斑即兔毫盏,如清代朱琰《陶说》“鹧鸪斑”条引《清异录》曰:“闽中造茶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所加按语曰:“《方輿胜览》云:‘兔毫盏,出瓯宁。’下注云:‘黄鲁直诗建安瓷碗鹧鸪斑,是鹧鸪斑即兔毫盏。’”有人认为兔毫盏即鹧鸪斑,但二者略有不同,如清末寂园叟《陶雅》卷下三十二曰:“兔毫盏即鹧鸪斑,第鹧鸪斑痕宽,兔毫针瘦,亦微有不同。”

在建窑遗址的废品堆积层里,兔毫盏标本俯拾皆是,说明兔毫盏是建窑的大宗产品,1989年5月至1990年5月建窑遗址发掘出土黑釉盏标本中,兔毫盏占60%,亦可证明。在建窑遗址里,鹧鸪斑盏标本却久觅难寻,曜变盏标本更是如同大海里捞针。这就说明,宋代建窑工匠配制的黑釉,比较适合兔毫斑的形成,也说明兔毫斑的生成对配方、窑内气氛和温度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鹧鸪斑釉和曜变釉则不然。

宋代建窑几乎只烧造一个品种的茶器,即黑釉茶盏,且产量很大,这在古代瓷窑中可算是孤例了。究其原因,与宋代的点茶、斗茶习俗有直接关系。宋代的点茶源于建盏的产地建安民间,经文人士大夫甚至皇帝的倡导,逐渐流传开来,后来将点茶发展成为一种竞技游戏,称为“斗茶”或“茗战”。建盏的胎体厚重,且越往下越厚重,重心低,放置稳当,便于点茶时击拂。胎体厚且内含气孔多,预热后不易冷却,利于点茶,点茶后还可保持茶汤的温度,延缓水痕的出现。另外建盏的釉面亮黑如漆,便于斗茶时观茶色、验水痕。正如蔡襄《茶录》所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熳(xié)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茶家自不用。”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亦曰:“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另外,建盏中大宗质量上乘的束口盏,在盏壁距口沿约6毫米至7毫米处,向内做成一周圆滑的凸圈,此凸圈是注水量的标准,起标尺的作用。因为点注时,乳雾汹涌,溢盏而起,所以要求茶汤适中,否则“茶少汤多则云脚散,茶多汤少则粥而聚”。

另一方面,由于建盏的结晶斑非人工描绘所为,纯属窑内变化所得,自



然天成,故对于崇尚质朴无华、平淡自然之情趣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来说,建盏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令把玩者诗兴大发。如蔡襄《试茶》曰:“兔毫紫瓯新,蟹眼清煮茗。雪冻作成花,云闲未垂缕。”苏东坡《送南屏谦师》曰:“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鹤儿酒。”惠洪《无学点茶乞诗》曰:“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又诗与客啜茶戏成》曰:“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纹刷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黄庭坚《信中远来相访且致今岁新茗又枉任道寄佳篇复次韵呈信中兼简任道》曰:“松风转蟹眼,乳花明兔毫。”在文人士大夫的倡导下,建茶、建盏相得益彰,风靡一时。

建盏上的铭文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宋徽宗为其宠臣蔡京举行过一次宫廷特宴,



▲ 建窑黑釉兔毫盏 故宫博物院藏

蔡京曾为此宴作《太清楼特燕记》。据蔡京所记,他自杭州奉御札手诏抵达开封时,徽宗先赐其“饮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被褥于西池”,后在太清池为其举行特宴。宴会上“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这里的“建溪毫盏”即指建窑烧造的兔毫盏。“斗茶”是指一种至嫩纤细的茶芽,也叫“小芽”,极为珍贵难得。北宋黄儒《品茶要录》曰:“茶之精绝者,曰斗,曰亚斗。其次拣芽。茶芽,斗品虽最上,园户或止一株,盖天材间有特异,非能皆然也。”据此可知,北宋政和二年前后,宫廷里曾使用建窑烧造的兔毫盏饮茶。

建窑遗址出土不少外底署“供御”“进盏”铭文的茶盏标本和印有这两种铭文阳文反体字的垫饼,说明宋代建窑确为宫廷烧造贡瓷。但晚清以前的谈瓷之书都没记载建窑烧造署“供御”“进盏”铭文茶盏这一事实。

晚清以来,因建窑遗址不断有署这两种铭文的茶盏和印有这两种铭文阳文反体字的垫饼出土,学界才开始关注这一现象。清末寂园叟《陶雅》最早记载当时福建出土建盏外底刻有“供御”二字,但没提及有署“进盏”二字者。书中曰:“或称近有闽人掘地所得古盏颇多,质厚色紫黑。茶碗较大,山谷诗以斗茶者也;酒杯较小,东坡诗以之盛酒也。证以蔡襄《茶录》,其为宋器无疑。曰瓯宁产,曰建安所造,皆闽窑也。底下偶刻有阴文‘供御’楷书二字。《格古要论》谓盏多撇口,则不折腰之压手杯也。”

后来,民国时期《建瓯县志》(1929年刊行)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书中曰:“兔毫盏,出义里……由山内挖出,

形式不一。唯池墩村水尾岚堆积该碗打破之底,时见‘进盏’二字,是阴字模印,楷书苏体。亦偶有‘供御’二字者,似刀刻的,字迹恶劣。附近村民挖者,或一日得数块,或数日得一块,每块售数十文钱,或数十洋元不等,时有入收运上海或日本。其盏内之花纹似兔毫,故名。”这段记载进一步说明窑址出土的建盏标本中,除刻“供御”铭文者以外,还有模印“进盏”铭文者,且在数量上,署“进盏”铭文者多于署“供御”铭文者。

1935年6月27日,在上海海关任职的美国人詹姆斯·马歇尔·普尔默教授曾赴建窑遗址进行考察,采集大量建窑窑具标本,其中有外底刻“供御”二字者,但他没采集到带“进盏”二字的建盏标本。

1954年5月华东文物工作队福建组调查建窑遗址时,在池墩村西头的水尾岚堆积区采集到外底刻“供御”二字和外底印“进盏”二字的建盏标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首次调查建窑遗址,并从中发现署“供御”“进盏”字样的标本。

1960年10月,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发掘芦花坪窑址时,发现署“供御”“进盏”阳文反体字样的垫饼。

1977年夏,考古工作者发掘芦花坪窑址时,除发现建盏标本上有“供御”“进盏”字样外,还发现一些垫饼上印有这两种铭文的反体字。

需要强调的是,以往谈建窑的书或文章对建窑遗址出土的一部分垫饼为什么会印有“供御”“进盏”铭文的反体字多交代不清。实际上,只要弄清建窑的装烧工艺,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考古发掘证明,建盏是一匣一盖装烧,且每件茶盏的外底与漏状匣钵内底之间都要垫一个比茶盏圈足略大的泥饼,由于装匣时泥饼湿而柔软,所以茶盏外底的铭文及圈足的轮廓即印在垫饼上,垫饼上的铭文亦即成为阳文反体。

窑址考古发掘证明,署“供御”“进盏”铭文的建盏是放在龙窑中最好位置——窑室中段烧成的,故成品率较高。“供御”“进盏”的字体并不规整划一,有的工整,有的草率。茶盏外底的“供御”二字全为刀具刻划而成,且“御”字的特征是右边的“卩”位置较低。“进盏”二字,多数为模印,少数为刀刻,且“进”作“進”,“盏”作“淺”。

一盏一世界。每一件建窑瓷器,都承载着匠人的智慧和汗水,它们不仅是饮茶品茗的实用器具,而且更是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品。欣赏建窑瓷器,既是对美的追求,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致敬。

